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SERIES OF
CLASSIC OVERSEA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CULTURE

中國上古天文

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歷史文化與社會經濟」

〔日〕新城新藏・著 沈璿・譯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國上古天文

〔日〕新城新藏◎著
沈璿◎譯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山西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上古天文 / [日]新城新藏著; 沈璿譯.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12
(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 / 鄭培凱主編)
ISBN 978-7-203-09218-6

I. ①中… II. ①新… ②沈… III. ①天文学史—
研究—中國—古代 IV. ①H146.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200054號

中國上古天文

叢刊主編 鄭培凱

著 者 [日]新城新藏

譯 者 沈 璿

責任編輯 梁晉華

助理編輯 郭向南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21號

郵 編 030012

發行營銷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傳真)

天貓官網 <http://sxrmcbs.tmall.com> 0351-4922159(電話)

E-mail sxskcb@163.com 發行部

sxskcb@126.com 總編室

網 址 www.sxskcb.com

經 銷 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廠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700mm×970mm 1/16

印 張 7

字 數 33千字

印 數 1—2000冊

版 次 2015年12月 第一版

印 次 2015年12月 第一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203-09218-6

定 價 21.00圓

《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編委會名單

總主編 鄭培凱

編委會 傅杰 霍巍 戴燕（按姓氏筆畫排序）

總策劃 越衆文化傳播·周威

總監製 南兆旭

統籌 徐勝 顏海琴

出版工作委員會

主任 李廣潔

副主任 姚軍 石凌虛

委員 梁晉華 張文穎 秦繼華 馮靈芝

張潔 崔人杰 王新斐 郭向南

設計總監 李尚斌

設計製作 王秀玲 吳圳龍 何萬峰 歐陽樂天

出版說明

《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選取一九四九年以後未再刊行之近代海外漢學作品，編例如次：

一、本叢書遴選之作品在相關學術領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學術研究方嚮、方法上獨具特色。

二、爲避免重新排印時出錯，本叢書原本原貌影印出版。影印之底本皆經專家組審定，原書字體大小、排版格式均未做大的改變。

三、爲使叢書體例一致，本叢書前言後記均採用繁體字排版。

四、個別頁碼較少的版本，爲方便裝幀和閱讀，進行了合訂。

五、少數作品有個別破損之處，編者以不改變版本內容爲前提，部分進行修補，難以修復之處保留缺損原狀。

六、原版書中個別錯訛之處，皆照原樣影印，未做修改。

由於叢書規模較大，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殷切期待方家指正。

— 總序 —

溫故而知新

晚清以來，西力東漸，西方文化思想的著作也大量譯成中文，最著名的如嚴復與林紓的譯著，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界與文學界，使得中國文化的思維脈絡爲之不變。除了西方思想經典、文學與實證科學著作的翻譯，以實證方法系統化探討中國文史的域外漢學，也對中國學術思想界產生了莫大衝擊，改變了中國學術的著述方法與取嚮。

中國傳統的知識結構，是按經史子集四庫分類的，以儒家意識形態的經學爲文化知識的砥柱，以史學爲貫串歷史經驗的殷鑒，至於子部與集部，則是作爲保存文獻、擴大知識面的附帶知識，可以耽情冥想，可以悠遊玩賞，却都是邊緣化的知識，無關聖教的弘揚，無關文化精髓的宏旨。西方文藝復興之後的現代學術體系，在知識分類上，與中國傳統大相逕庭，講究系統分科，不同知識領域各有其客觀存在的價值，有其相對獨立的目的與標準。日本知識界在明治維新以來，鑒於東方文明落後於西方的船堅炮利，率先效法西方，在追求“文明開化”、“脫亞入歐”的過程中，爲日本學術發展循着現代西方的體例，建立了哲學、文學、歷史學、經濟學、法學、商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醫學、農學、工程學、植物學、動物學等等新型學科，企圖與西方學術齊頭並進，從而影響了中國

近代學術體系的發展。

本叢刊選印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漢學譯著近百冊，分爲三大類：“歷史文化與社會經濟”、“古典文獻與語言文字”、“中外交通與邊疆史”，反映民國時期學術界重視西方及日本漢學研究的成果，藉助他山之石，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意義，特別是開拓了傳統學術忽略的領域。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學者如蔡元培、胡適都提倡“整理國故”，以理性實證的方法，對中國文化傳統做出系統化的研究，是與這些漢學譯著相輔相成的。這些譯著除了介紹域外漢學的成果，還引進了嶄新的學術研究方法與視角，有助於梳理中國文化傳統的脈絡，重新整合知識結構與學術體系。雖然這些學術著作不是中國學者的成就，無法納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史學術的主脈，但是從中文譯本的影響而言，起碼也應當視爲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的支脈或潛流，不容忽視。可惜的是，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因爲兩岸政治形勢的變化，這些漢學譯著，除了部分因王雲五重新入主臺灣商務印書館，而得以在臺灣做了少量的重印，在大陸的出版界，則完全受到遺忘，甚至在許多新成立的大學圖書館中也不見踪影。我們搜集了近百冊塵封的漢學譯著，呈現給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學術界，一方面是爲了銘記前人爲推展學術而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爲了提醒新常態時期的學人，學術發展有其歷史累積的脈絡，可以從中汲取歷史經驗，溫故而知新。

說到“溫故知新”與這批早期漢學譯著的關係，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思考，以見翻譯域外漢學如何反映了時代精神，爲融匯東西方學術思維，重新闡釋中國文化傳承，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一是域外漢學的研究對象，以中國歷史文化典籍爲主，屬於中西文化碰撞期間興起的“國學”範疇，與五四新文化人物提倡的“整理國故”運動若合符節。研究中國歷史文化，並賦予新的學術意義，是清末民初知識精英念茲在茲的心結。歷史發展走到一個環節，時代的狂風揚起了批判傳統的大旗，風中的英雄幫着推波助瀾，却又無時或忘自己民族文化主體的未

來，糾纏於“傳統”能否“現代”的困境。域外漢學的出現，以西方實證方法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綜合東西方各種語言文字材料，擴大了研究國學的眼界，即使無法打開中國文化傳統是否走到盡頭的心結，至少是提供了一個解惑的方嚮，在大霧瀰漫的夜晚，看到了依稀渺茫的星光。

二是翻譯域外漢學，有一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吊詭作用，逐漸化解了中國文化思維中的自大心理與封閉心態，讓唯我獨尊的國粹基本教義派解除武裝到牙齒的盔甲，轉而吸收並接受西方實證研究的學風。民國期間新式教育制度的推行、學術體系的變化、大學學術專業的創建，具體到北京大學國學門的成立，中央研究院規劃歷史、語言、考古的研究領域，都與翻譯域外漢學背後的旨意是息息相關的。因此，重新閱覽這批民國期間的漢學譯著，對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學人來說，溫故而知新，不但可以窺知民國學人追求新知的心理狀態，也會刺激吾人反思，認真思考學術研究方法與中國學術發展的前景，更進一步，探索文化傳統的重新闡釋與新知介入的關係。知識體系的變化當然與傳統的重新闡釋有關，是外爍的影響大呢，還是內因變化的成分居多？

《論語·為政》記載孔子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歷代解經，對這個“為師”的道理，有兩種相近似但又取嚮不同的解釋。朱熹《四書集注》說：“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雖然朱熹把知識分為“舊所聞”與“新所得”，強調的却是“學而時習之”，從中生發新的心得，也就是從詮釋舊典中得到新知。這個說法與朱熹在鵝湖之會以後，作詩唱和，寫給陸九淵的詩句，“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異曲同工，是一個意思，萬變不離其宗，舊學與新知是同一個脈絡的知識學理。

然而，有些朱熹之前的經學家，解釋“溫故知新”，却有不同的取嚮。皇侃

《論語義疏》就說：“故，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尋之不使忘失，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即時所學新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亡也。若學能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乃可爲人師也。”皇侃明確說到，“故”指的是過去所學的知識，而“新”則指的是新近學到的知識，新舊結合，相互發明，就可以“爲人師”了。邢昺《論語注疏》循着皇侃的思路，也說：“言舊所學得者，溫尋使不忘，是溫故也。素所未知，學使知之，是知新也。既溫尋故者，又知新者，則可以爲人師也。”這裏講的“素所未知”，就不祇是研讀舊學，有了新的體會，從過去的傳統中發展出的“新知”，而是從來沒聽過、沒想過的新學問了。這種“素所未知”的新學問，結合“舊所聞”，對習以爲常的知識框架，就會產生巨大的衝擊，而出現飛躍性的結構變化。知識內容或許大體沿襲傳統，知識結構却得以重新整合，出現嶄新的認知系統，重新審視自己文化傳統的意義，打開文化傳承的新局面。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漢學譯作，就發揮了這樣的作用，促使中國學者放棄自我中心的文化態度，從各種不同側面，探知中國歷史文化的光譜，以域外（或是全球）的角度觀測中國傳統，搖動了文化的萬花筒，看到七彩繽紛的中國。

嚴復在甲午戰爭之後，改良變法思想風起雲湧之時，開始大量翻譯西方思想經典著作，是有感於國人（特別是傳統文化孕育的知識精英）思維系統封閉，企圖介紹實證新知，引進邏輯思維的方法，以破除儒學之道“一以貫之”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虛妄。他翻譯《天演論》，在序文中提到，有人歸納東西方學術思想，認爲中國文化重精神，是形而上之學，立意高超，而西方文化重物質，是形而下之學，祇追求功利的回報。他認爲，這種自以爲是的蒙昧態度，陷入傳統舊學的框囿而不自知，沒有自我反思的能力，無法吸收“素所未知”的新知識，也就無法開展並弘揚自己的文化傳統。嚴復非常清楚他翻譯西方經典的目的，是爲了介紹新知，打破中國傳統思維的封閉性，但是，作爲披荆斬棘的拓荒人，他

深知思想封閉者的頑固心理，必須因勢利導，以免遭到盲目衛道之士的攻訐。嚴復有其防身的策略，不會像許褚戰馬超那樣赤膊上陣，而是以桐城文章譯述赫胥黎、斯賓塞、穆勒、亞當·斯密、孟德斯鳩，博得晚清知識精英的贊許，文章深閤而傳入了新知義理。從文化變遷的角度而言，通過翻譯，以迂迴戰術來介紹西方思想，得到巨大的成功，產生了改變傳統思維體系的實效，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深遠的大事。以此類推，民國時期大量翻譯域外漢學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思想史課題。

關於清末民初西方學術思維衝擊中國知識精英，顛覆傳統文化的知識結構，錢穆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的序言中，從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發出深刻的感慨，做了籠統的批評：“文化異，斯學術亦異。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別。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循至返讀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響將來學術之發展實大，不可不加以討論。”錢穆所指出的問題，是傳統知識體系強調“通”，文史哲不分家，最崇尚通儒，而現代學術講究專業分科，各司其職，以至於讀不通古籍呈現的整體性知識思維。姚名達在撰寫《中國目錄學史》的時候，對西力東漸，西潮帶來的翻譯著作及新知新學，也有類似的感慨：“四部分類法，不合時代也，不僅現代為然。自道光、咸豐允許西人入國通商傳教以來，繼以派生留學外國，於是東西洋洋籍逐年增多。學問翻新，迥出舊學之外。目錄學界之思想不免為之震蕩。”這種對學術體系發生重大變化的觀察，反映了中國學人從晚清一直到民國，夾在東西方兩種不同思維體系的衝突中，身歷其境的切身感受，因此感觸良多。

二十世紀上半葉最能代表中國學術的通儒是王國維與陳寅恪，他們浸潤了經史子集的四部知識傳統，承繼乾嘉篤實的考據學風，却都經過西洋邏輯思維與實證科學的洗禮，參與中國知識結構的轉型。對西方現代知識結構如何在中國生根發芽，不但再三致意，並且以自己的學術實踐來努力促成。王國維早在一九〇二

年就寫信給張之洞，反對把經學列為大學分科之首，而主張效法西方與日本的大學，設立哲學科，明確指出知識結構的分類不可因循傳統，而必須另起爐竈。陳寅恪在一九二五年就清華大學建制的問題，寫了《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指出大學的職責在於學術之獨立，而中國學術界的情況令人十分不滿，必須認真效法西方學術的體制及實踐。他說：“蓋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重在知彼，絕非閉門造車者比。”這兩位國學大師，對西方與日本的漢學研究十分注意，都是以開放態度對待域外漢學研究，集思廣益，以成其大家。

再回到“溫故知新”的歷代經解，說說文化傳承的闡釋學意義。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指出，上古之時，文化知識是上層統治精英的家學，不再治理實際政事的長者可以傳遞德行的知識，可以為人師。“溫故而知新”，就顯示長者不忘舊時所學，且能吸收新知，繼承并發揚這種學術與政治合一的傳統。到了孔子之時，時代出現了變化，士大夫不見得能够謹守家法，弘揚德行，也不一定能够“為師”了。孔子之後，世變日亟，“道術為天下裂”，文化知識不再為少數統治精英所壟斷，也不必然與治理政事有關，學術在民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是，學術知識發展的脈絡基本未變，仍然是要溫故知新，進德修業。從劉寶楠不經意的闡釋中，可以看到時代變遷影響了學術文化的內容，改變了知識結構的體系，但其內在發展的理路仍舊，還是需要舊學與新知的融合，才能有所發展。

劉寶楠還引述了劉逢祿的解釋：“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製作，漢初經師皆是也。”劉寶楠贊成這個說法，並指出，漢唐人解釋“知新”，大多數都沿用此意。也就是說，舊學是傳統的知識結構體系，新知是時代變化出現的新知識，必須相互斟酌，才能發揮得宜。至於如何對舊學“通其大義”，就見仁見智，各有說法了。從這個通達的詮釋來討論近代西學東漸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溫故而知新”在民國學人的心底，是產生“傳統”與“現代”糾葛的心理陷阱，不易跨越。若依照朱熹的說

法，“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雖然在哲理上可以模模糊糊說通，但在清末民初的具體歷史環節，西學的新知屬於完全不同的知識體系，在原有的舊學脈絡中，根本無從立足，如何“其應不窮”？所以，真要放之四海而皆準，提升“溫故而知新”的普世意義，以理解域外漢學譯著與近代學術知識體系變遷的文化史意義，我們認為，皇侃、邢昺，一直到劉寶楠的闡釋，是比較合適，並與現代文化闡釋學的說法相近。

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在他的名著《真理與方法》中，說到認知理性與文化傳統的關係，特別指出，人們通過理性，來判斷歷史文化中事實的真相，但是人的理性與生存環境息息相關，與傳統所衍生的豐富文化底蘊有關，不可能完全超越文化傳統的思維脈絡。他認為，人生活在文化傳統之中，就不可能“遺世獨立”，以全能超越的抽象思辨來認識傳統，甚至是批判或顛覆傳統。傳統是歷史文化延續與傳承的表徵，不會一成不變，而我們的認知理性也會因時代變遷，而不斷重新詮釋傳統。伽達默爾的闡釋學以西方文化傳統為例，說明新知如何納入傳統，而使文化傳統生機不斷，生生不息，與中國歷代經學家的說法（朱熹除外），有異曲同工之效。以此觀照民國時期的漢學譯著，我們認為，這批學術新知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繁衍與發展，實有承先啓後之功。

《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的出版，最值得感謝的是南兆旭先生二十多年來搜羅的執着與努力。雖然這套叢刊不能窮盡民國時期的漢學譯著，但是，能匯集上百冊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在國內不曾重印的學術著作，再度公之於世，總是功不唐捐的大功德。忝為本叢刊的主編，我面對這批民國學術材料，先是感到紛雜無章，有些原作者的學術素養也難副當前的學術標準，甚為猶豫。後轉念一想，這是上個世紀中國最紛亂時期的學術記錄，也是民生凋敝，國勢隕危，內亂外患交加之際，仍有許多學者孜孜矻矻，戮力翻譯域外漢學，為中國學術的傳承拓展新知的坦途，不禁肅然起敬，開始用心整理分類。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好在有學

殖豐贍的諍友擔任分卷主編，並撰寫各分卷前言，實在是衷心銘感。有傅杰教授負責“歷史文化與社會經濟”、戴燕教授負責“古典文獻與語言文字”、霍巍教授負責“中外交通與邊疆史”，吾道不孤矣。在整理編輯過程中，周威先生費心最多，也是我要衷心感謝的。

道術之存亡，全在人心之嚮背。這批民國漢學譯著重新問世，對我們生長在承平之世的學人，應當有激勵的作用，為學術研究多盡份力，讓中國學術發展更上一層樓。

鄭培凱

二〇一五年七月

— 前 言 —

一九四九年，身在美國的鄧嗣禹在《遠東季刊》發表《近五十年中國歷史編纂學》，總結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編纂學從保守走嚮開放，“先是受日本，然後是英國、美國、法國，最後是蘇聯等影響”，既擴大了史料的範圍，又應用了科學的方法，把重點從帝國的政治事件轉移到社會經濟方面，終於“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鄭培凱教授主編的《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正是鄧氏提及的各國影響中的一部分——甚至堪稱是主要的部分。

本分卷主要包括兩大類：一是歷史文化，包括渡邊秀方《中國哲學史概論》、三浦藤作《中國倫理學史》、津田左右吉《儒道兩家關係論》、服部宇之吉《儒教與現代思潮》、五來欣造《儒教政治哲學》、濱田耕作《東亞文化之黎明》、梅原未治《中國青銅器時代考》、新城新藏《中國上古天文》、卡特《中國印刷術源流史》等；二是社會經濟，包括沙發諾夫《中國社會發展史》、駒井和愛等《中國歷代社會研究》、柯金《中國古代社會》、森谷克己《中國社會經濟史》、田崎仁義《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及制度》、卜凱《中國農家經濟》、馬札亞爾《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克拉米息夫《中國西北部之經濟狀況》、高林士《中國礦業論》、長野朗《中國資本主義發達史》等（以上作者譯名一仍所收各譯本）。這些著作引入中國的背景與影響，培凱教授的總序已經作了高屋建瓴、提綱挈領的論述。

這裏祇就著作、作者、譯者三端分別舉例，略作一些補充說明。

先說著作。包括本輯在內，本叢書所選入的日本學者論著佔據了多數。曾有西方的東方學家概括日本學術實爲三餘：文學竊中國之緒餘、佛學竊印度之緒餘、各科學竊歐洲之緒餘。其言雖刻薄，却一針見血。但也正因善於嫁接，所以在用西方研究模式梳理中國歷史傳統方面，日本學者往往最具搶佔先機的便利，他們的著作也成爲當時的中國最多引進與借鑒的對象。例如梅原末治藉助於西方科學方法來分析中國青銅器的器形、成分，進而推論其時代的《中國青銅器時代考》在半個世紀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歷史學家呂思勉在《先秦史》中就引用過他對殷商時代青銅器的分析，考古學家黃展岳在《關於中國開始冶鐵和使用鐵器的問題》中則對他殷代已知用鐵的觀點提出駁正。卡特的名著出版至今九十年，仍然是時常被引用的經典，除早期的節譯本，一九五七年北京出版了吳澤炎譯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一九六八年臺北出版了胡克希譯的經傅路德修訂的卡德著作新版《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其書既出，哲學大師杜威也給以好評，桑原鷺藏、鄧嗣禹發表了長篇書評。直至本世紀芮哲非的新著《谷騰堡在上海：中國印刷資本業的發展（一八七六一一九三七）》，還指出正是卡特著作的出版，因其表彰中國印刷術的悠久歷史和對世界印刷史的巨大貢獻，迅速影響了一批中國學者，進而影響了近代以來的中國印刷史書寫。其實，受影響的還不止是印刷術與中西交流史的學者。以《夢溪筆談校證》而蜚聲中外的當代《夢溪筆談》研究第一人胡道靜回憶，正是從卡德的書中，他才知道《夢溪筆談》：

卡特的書說明了史料的來源，還特別夸譽了《夢溪筆談》這部著作，說它這好那好。於是我這個當時對古籍祇讀先秦、兩漢之書的小伙子就迫不及待地去找這本沈括的名著來閱讀了。（《夢溪筆談校證

五十年》)

至於沙發諾夫、柯金、馬札亞爾等用唯物史觀來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論著，在蘇聯和中國都引發過爭議，而在當時就有學者指出，陶希聖等人對魏晉時期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即深受沙發諾夫《中國社會發展史》的影響。

次說作者。各書作者背景各異，身份不一，研究中國的目的也頗有差距。其中既有津田左右吉這樣的學術大師，更不乏各學科中的權威名家，而且不少跟中國還有密切的聯繫。如濱田耕作與梅原末治師徒都在中國從事考古多年，不僅以自己寫下的著作、也以自己參與的活動，影響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甚至自己的工作給中國考古學家樹立了榜樣。早在一九二六年，北京大學國學門的考古協會與日本東亞考古協會成立東方考古協會，被譽為日本考古學之父的濱田耕作就參與其事，一九二九年他又與高足梅原末治再赴北京演講，為正起步的中國現代考古學注入了新的信息。其後梅原又在上海、天津、河南等地調查文物古迹。

撰《中國上古天文》的天文學家新城新藏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出任過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所長。撰《中國農家經濟》的美國學者卜凱從康奈爾大學農學院畢業後，次年即來安徽宿州，以傳教士的身份從事農村的改良試驗與推廣，在中國致力農業經濟學的教學與調查幾三十年。同樣是以傳教士身份在安徽宿州從事教育與宗教活動長達十二年的還有美國學者卡德——而他一生祇活了四十三歲。在離開中國後他一直從事中國學術的研究，在伯希和指導下研究中國印刷術的發明與西傳，傾注了滿腔的熱情，用盡了全部的心力，終以勤勞過度，在該書出版的當年與世長辭。

末說譯者。當年就有學者感慨，外國的漢學著作可資參證者甚夥，但譯著的數量與質量總體而言殊不令人樂觀，通西文者多鄙棄漢學，治國學者又忽視西文。從事者的學養並不都足以勝任這類專門著作的翻譯，因此有的譯文比較粗

糙，但就已有的成績來看，仍有可稱道者。一是有的著作不止出版了一個譯本，如濱田耕作《東亞文化之黎明》、馬札亞爾《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等時隔不久就出版了不同的譯本；有的甚至同一年中就出版了兩個譯本，如森谷克己《中國社會經濟史》在一九三六年既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孫懷仁的譯本，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陳昌蔚的譯本。二是譯者之中不乏後來的著名學者。如高林士《中國礦業論》的譯者是曾擔任北京水利水電學院院長多年、為中國水利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汪胡楨。在年過九旬之後寫的自述中，他還憶及當年由丁文江介紹認識了《中國礦業論》的作者、並受作者之托翻譯該書的經過。而梅原末治《中國青銅器時代考》的譯者則是舉世公認的甲骨學與殷商史權威胡厚宣，身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他正是在參與殷墟發掘之際譯出梅原末治的著作的。

世事沉浮，風雲變幻，這些昔日的譯著有的還在被學者屢屢提及，有的則塵封甚久，不再被人記得。如今輯而再印，使之重見天日，是既富於現實意義，也富於歷史意義的。現實意義在於這些譯著中的若干材料仍可供今天的讀者取資，若干見解仍可給今天的讀者啓示；歷史意義在於這些譯著中的部分雖然陳舊過時，無論材料還是觀點都被證明千瘡百孔，但它們在中國現代學術史的建立與發展進程中都曾經多多少少起過作用——因此它們不再僅僅是外國漢學史的組成部分，實際上也已經成為中國學術史的組成部分，是我們不能輕忽，更不能遺忘的。

傅 杰

二〇一五年七月